

# 唐家岭的“保护费”

完

社会实录



廉思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 上期回顾

有人离开，又有人搬进来，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唐家岭上演着……

清晨的北京安静祥和，路旁的灯光在晨雾中散射，融化了平日的喧嚣。窗外的气温是-13℃，即使躲在车里，也能感受到窗外的凉气。

廉思师兄专心看路，冯丹仔细查看着地图，而我（今日这篇文章的作者沈路）则在摆弄三台照相机，检查着电池和储存卡。今天我们的任务，是用相机记录下唐家岭这群年轻人真实生活的一天。

我们赶到唐家岭，此时已是2009年1月13日早上六点半，远远就看到了公交车站黑压压的人群。在前期调研中，有很多唐家岭的受访者向我们描绘了公交车站早班车的恐怖。他们曾说，不看一看唐家岭人上班的场景，你们就不会真正了解唐家岭人的生活。在来的路上，我曾一次次想象这些拥挤的景象，但我们还是被拥挤的现场震惊了。

一辆辆公交车缓慢地朝车站驶来，那些等车的人有如潮水一般沿着公交车行驶的方向挤去。人们用力敲打着车门，又喊又叫地看着司机，希望汽车停在自己身边。

车子还未停稳，无数的年轻人便将车门团团围住；车门一开，人们立刻连冲带撞向车里涌去。靠近车门的人使出浑身力气只想再往前挪动一寸；中间的人一手弯曲着往前推，而另一只胳膊护在身后，杵着后面人的脖子，为自己挤出一点呼吸的余地；有的人嘴里还塞着早餐，一边咀嚼一边向人堆里蹭，以便寻找突破口；而身后还有许多人看着黑压压的人群望洋兴叹，对眼前这趟车已经不抱太大希望。原本空空的，瞬间已是人贴人，车里的每个人都变成了压缩饼干，叫嚷声乱成一片。车门处的人尽力抓住可能抓住的任何东西，以免一时大意被挤下车。

怪不得北京公交总公司更喜欢聘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作为售票员

和安全员，我面前这三个壮汉安全员唯一的工作便是努力将人塞进车中，然后把随时会被挤爆的车门用力关上。

公交车站的人流把我们三个人冲散了。我按照原定的安排，开展工作。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我开始拍摄目光所及的场景：满是污垢的早餐摊点、电线杆上形形色色的广告、随处可见的房屋出租信息、简易厕所前冰冻的污水、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

在我举着相机取景时，一只大手突然挡住了我的镜头，我还来不及有任何反应，相机便被一把抢了过去。

“干什么的？谁让你随便拍照的？”横在我眼前的是两个五十多岁的壮汉，他们穿着治安制服，凶神恶煞一般。说话的那个人抓着我的相机，一脸警觉。他们身后有一个火堆，火堆旁有两个穿同样制服的妇女警惕地朝我上下打量。火刚生好，火苗往上蹿着，映着两个妇女通红的脸。

愣了足足十秒钟后，我赶紧掏出学生证递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我只是个学生，因作业需要才来这边拍照的。货真价实的学生证使他们的疑虑有所消减，他们开始煞有介事地翻起了我相机中的照片。我十分配合，帮他们翻看唐家岭公交车站的照片。四个“治安制服”都努力地往小相机前凑，努力地想看个究竟。

又是赔笑脸，又是打保证，磨了足有十分钟。我好不容易才把相机取了回来。相机一到手，我头也不敢回，拔腿就往街对面跑去。

廉思他们俩也遭遇了那些“治安员”，几乎是“逃”出来的。

在前期调研中，曾有受访者提到过“保护费”。这时我心里预料，这些治安人员，可能与保护费有一点关系。

我们藏好了相机，沿着唐家岭的主路前行，来到唐家岭的另一个公交车站，在等车的人群对面便是个熊熊燃烧的火堆。火堆旁也有四个穿着治

安服的人，他们手中拿着一叠票据，不时把过往行人喊住，收了钱，给张票。人们对这种行为也没什么特殊反应，都是交钱走人。

我低声向我旁边等车的男子问道：“你们知道对面坐的都是些什么人吗？”

“他们啊，就是收水费的呗。”  
“水费？就是保护费是吗？”我又将声音压低了一些，心想这下正好逮个正着。

“对啊。”男子诧异地看着我，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每个月都收。”  
“那都是什么时候收？多少钱？”男子看着对面跳动的火光，笑着说：“也就十块钱，每次时间都不固定，他们也害怕被人逮到。”

“是所有人都交吗？有没有不交的？”

“就十块钱，你不交他们不让你走，一直缠着你，反正也不多，大家就都交了，省得惹麻烦。”他有些无奈地说。

“出现过冲突吗？”我关切地问，四下扫了眼周围的人群。

“有，听说有被围起来打的，怪吓人的。”他耸了一下肩。

听了他的话，我们三个心中有了底，既然有幸遇见了传说中的“收保护费的”，肯定不能放过。我们向路对面的火堆走去。

在经过火堆时，我们很自然地分开，好像谁也不认识谁。我看到两个“治安制服”在盘问一对年轻人，便悄悄地站在了他们后面，拿起手机很镇定地录音。

“你们交水费了吗？”

“交了，交了，交了一份。”女孩子边说边赔笑脸，生怕得罪了这群人。

“你们两个人怎么只交一个人的水费啊？”穿治安制服的壮汉没好气地问道。

“我刚来，就住两天。”男孩子赶紧回答。

“刚来也是住！就是住了一天，也要交水费。”那壮汉不依不饶。

“如果长住我肯定交，我住两天就走。”男孩子试图辩解，女孩子在一旁吓得不敢吭声。

“那你头发怎么是湿的？是不是洗头了？你用了水就要交水费！”壮汉提高了嗓门，脸红脖子粗。

面对这种“道理”，男孩子无话可说，女孩子催促着男孩子交了钱赶快离开。壮汉把钱收好，撕了张票据，翘起了胜利的嘴角。

我们开始密谋如何骗取一张水费单。由于我们已经在多个火堆旁露脸，怕被那些治安员认出，便另觅了一处收费点下手。我和冯丹揣着二十块钱，朝着巷子口的“火堆”走去。

如我们所愿，我们刚出现在火堆旁，立刻有一个穿治安服的人将我们拦住了：“交过水费了吗？”

我装着老练地说：“没交过。”我拿出十块钱，指着冯丹说道：“他是来找我的，不住这儿。”我以一老住民的语气很快拿到了一张水费单。

那人打量了一下冯丹，没有纠缠下去，我们顺利过关。

拿着这张“水费单”，我们如获至宝，走远之后，便仔细看了起来。

水费单上写着“外来人口缴纳卫生费、水费凭证（户口不在本村的人员）”，盖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经济合作社”的财务专用章。“水费单”的最后方还有一行醒目的话：注意保存，当月有效，随身携带，损坏转借者处以十倍罚款，造假者百倍罚款。

我注意到这张水费凭证上的编号是No.0106912，按这个编号，他们已经收了10多万份“水费”，合计有一百多万元！机缘巧合，我们选择了今天来拍摄唐家岭的早晨，让我们有幸撞见一个月才有一次的“收水费日”。

# 语言变化中的文艺潜流

7

畅销读物



编者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上海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梁文道 我读》是基于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而来的，这个节目通过主持人每天介绍一本书，让观众用最便捷的方式接触到书籍的精髓，进入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书中世界。

这是一本近似于社会时评的文集，作者从某本书出发，引申出对社会、人生等各方面的看法，语调轻松有趣，以说故事为主，启发读者：书可以这样读。

## 上期回顾

70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今天在我们国家很多重要领域里面的中坚分子身上一定烙着70年代留在身上的印记。《七十年代》这本书，邀请了几十个人，一人写一篇回忆，一人写一篇自述。梁文道谈的是其中的共性……

《七十年代》中，黄子平的文章里，有一点我特别有同感。他从70年代大家的生活遭遇去观察中国语言文字的变化，我也对这点也很敏感。当年他们曾经有个伙伴，把一封情书塞到一个女孩手中，大伙儿就闹，说拿出来看，这是耍流氓的行为。谁知道那个情书上面没有什么软绵绵的情话，反而抄了三条最高指示：“第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第二，要互通情报；第三，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这就叫情书啊，换句话说，连情书都要用这样的语言来写，省得被人说是耍流氓，当然也不排除有开玩笑的成分。

问题是，就算有玩笑的成分我们也不能忽略当年的那种语言是如何进入大家日常生活的，甚至使得我们的语言变得贫瘠起来。因为我们有太多话不能说了，很多过去的文艺小说，例如鸳鸯蝴蝶派都被扫掉了，我们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谈情说爱？

黄子平回忆说：“到70年代，所有作为四旧或小资情调的东西，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用来说男女之事的词儿，只剩下最单纯的‘好’这个字，说谁跟谁好上了。解决个人问题通常体现为一种组织上的关心。”据说当时上头开始重视女知青被淫辱等众多事件，一个连上的指导员被检举，说他淫辱女知青。后来大伙儿开车，路上经过连上指导员的家，看到他给人封了，路过的时候，有人就说：“嘿，这人还真能改善生活啊！”

70年代有很多文艺潜流在地下发生，一些是一部分回城的知青自己搞个小沙龙，回城之前他们在乡间经常串联到不同村子一块儿聊天，就算不到别的村子，晚上私下会和

有很多通宵的聚会。

我们不能忘记那是一个有点儿压抑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很压抑的年代，在这个压抑的年代里闹出了很多笑话。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是笑话，在当年却一点儿都不好笑，甚至显得有点儿可怜。

举个例子，在《七十年代》这本书里艺术家徐冰回忆他当年到一个地方去下乡，这个地方很奇怪，表面上是一夫一妻，实际生活中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哪个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好心人被骂得实在也觉得冤枉。

更妙的是，他说那年头电影队一年出现一次，“在那个禁欲的年代，山沟里在性方面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这很令人惊讶，对不对？我这种在香港、台湾长大的人，真没想到文革期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时候性是特别压抑、特别“不随便”的。

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台湾念书的时候，有个电视剧，是一个政治宣传片，叫《寒流》，拼命丑化中国大陆的情况，特别是讲到文革的时候，以前搞的各种运动多凄惨等等。后来我发现里头有真有假，真的部分是什么呢？比如诗人（翟永明）就说到，他年轻的时候，有个朋友叫严丽，曾经在电影院里被人耍流氓，“严丽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身材也很好。回来之后，严丽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只记得在一帮小孩里面，严丽一下子变得很神秘和不可捉摸。那时候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严丽

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中，变得比她原来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里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跟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人对我们这些小屁孩流氓呢？”你看这个想法，为什么会对一个受到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人感到特别，觉得她很有魅力？这是在怎样极端压抑的情况下，欲望的一种投射跟宣泄啊，这种意淫实在奇怪。

王安忆的回忆也很有意思，她说她注意到当年下乡到魏庄的时候，她是文工团的。她在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辫子上系了宽宽的白带。王安忆形容，正应了一句俗语“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来这个格外的装束有一种不同的韵味。

文工团的女孩就是与旁人不同，在那样俭朴的年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居然在一个戴孝的女孩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出她那种妩媚的女性气质，这想起来真有点儿奇怪。

另外，除了这些性啊、感情啊，对人体的审美之外，肚子的问题或许更重要。朱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面说到，那是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回他们在食堂里被清查，整个食堂被查翻，追究有没有阶级敌人下毒，查来查去不了了之，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几个月没吃上肉，那天食堂善心大发，给他们安排了一锅炖牛肉，食堂由于急着让大伙儿吃上肉，肉没炖烂就出锅。尽管大家有一个朝气蓬勃的胃，但是也无法消化没有炖烂的肉，这也算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

张朗朗说到一件跟吃有关的事情，他的情况比较惨，他是坐牢。坐牢的时候有一个狱友叫老李，老李

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一个名厨，阴差阳错被外交部选中派到国外，在莫斯科布达佩斯呆过。

后来有人在国外揭发，说他买菜的时候有猫腻，马上被送回来，这就很严重了，什么罪名？这叫做叛国投敌，于是这个“叛国投敌”的老李进来跟他们坐一块儿。这时候上头要求这些关在监狱里的厨师想办法怎么样出去，因为好厨师都在坐牢，现在得弄几个出去，大概是要给一些国外政要献艺。于是一伙厨师就在监狱里头听老李口述自己的拿手菜，大伙儿拿着笔、拿着本子，一本正经地围坐在老李周围。

老李用他的无锡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张朗朗评注：“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越写越饿，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子脑袋了，细细道来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他口中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是中餐还是西餐，均可录入顶级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一次成功的传承。”

说到文化传承，很多人都说，文化大革命砍断了中国文化原先的脉络。这几年我看了很多回忆录，发现毁了不少，但有些东西没断。说不定就是在这样的监狱里面，一个身怀绝技的老厨师跟狱中的朋友们一起说说看，我当年一道菜怎么怎么弄。虽然大伙儿现在手上什么工具、什么材料也没有，那些菜都只能当传说来讲，但保不准哪位出去之后就凭着这个记忆自己开个个体户，重新又弄起来了。虽然经过残酷的打击跟冰封，但是我觉得很多文化上的种子，被埋在冰底下，待到稍微有点儿生机，略有暖意的时候，它就会想办法长出芽来，即便长得不好，但起码是出来了。